

“退而不休”的劳动者：转型中国的一个典型现象

程 杰*

内容提要 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活跃着一群“退而不休”的劳动者，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享受养老金待遇且仍然从事就业活动；二是没有养老金的老年人继续从事就业活动。根据2011-2012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估算，全国45岁及以上劳动者中“退而不休”劳动者已经占到35%，规模总量大约9800万人，农村和城镇分别约为8400万和1400万。农村主要由缺乏养老金的老年人构成，归因于养老保障制度缺失，而城镇主要由享受养老金的就业人员构成，归因于转轨过程中不完善的退休制度。“退而不休”现象是中国特定发展阶段与经济体制转型的共同结果，尽管存在经济发展规律的合理成分，但更主要源于相关领域改革的不彻底，背后反映出劳动力市场中公平与效率的损失。构建与劳动力市场相协调的养老保障制度是改革基本方向，针对不同类型群体应该明确合理的政策导向，让不该退休的人成为正常劳动者，让该退休的人能够顺利退出劳动力市场。

关键词 退休 劳动者 养老金 转型

一 引言

当前中国此种情景屡见不鲜：在农村，老人们仍然在农田里辛勤劳作，他们似乎

* 程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电子邮箱：chengjie@cass.org.cn。本文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养老医疗保障对农村中老年人的劳动供给效应”（7110319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NSFC-CGIAR 项目“人口变化、城乡人口流动和中国的农业与农村发展”（713111025）的资助。论文在第十四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2014·北京）和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2014·深圳）报告交流。感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的数据支持。

要活到老干到老，永远没有真正安享晚年的一天；在城镇，刚过不惑之年的职业女性，从诸如红十字会血站这样的国有企事业单位提前办理了退休，开始享受着退休金，现已被某家企业聘用，新的职业生涯似乎刚刚开始。他们或者是已经进入老年阶段，但仍然继续工作，或者是一边拿着养老金一边继续工作，这些本该“退休”的中老年人持续活跃在劳动力市场中。为何中国会出现如此景象？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扮演什么样角色？带来了哪些影响？他们又该何去何从呢？本研究尝试提出中国转型背景下劳动力市场中的一个典型现象，并对现象背后的成因及其造成的影响进行探讨。

从国际视角观察，老年人退休后继续工作的现象并不特殊，而且呈现越来越普遍的趋向。在过去几十年中（见图 1），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国家 65 岁及以上男性的就业率（即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保持在 15% 以上，进入新世纪以后呈现出稳步提高态势，2013 年就业率达到 18.2%，其中，美国这一群体的就业率从 1990 年的 15.8% 提高到 2013 年的 22.2%，英国的就业率也达到 12.9%。亚洲国家的日本与韩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较低，男性老年人继续工作的现象更为普遍，日本 65 岁及以上男性就业率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曾经高达 35% 以上，随后有所下降并稳定在 30%，韩国的老年人就业率更高，长期稳定在 40% 左右。欧洲生活品质与工作环境改善基金会研究显示（Eurofound, 2012），目前欧盟国家（EU-27）有超过 400 万的 65 岁^①及以上老年人仍然在继续工作，尽管老年人的就业率要低于美国、日本等国家，但呈现逐步提高的趋势，65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就业率达到 5%，其中，65~69 岁老年人的就业率从 2005 年的 8.8% 提高到 2011 年的 10.5%（男性为 13.5%、女性为 7.9%），葡萄牙（21.9%）、英国（19.1%）、爱尔兰（16.0%）、瑞典（15.4%）等成员国的老年人就业率相对更高。调查显示，欧盟国家大约三分之一的老年人表示愿意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后继续工作。Deller et al. (2011) 将达到退休年龄之后继续工作的人称之为“银发工作者（Silver worker）”，这种类型的工作也被视为“搭桥就业（Bridge employment）”，作为常规就业状态与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一种过渡或衔接（Gobeski & Beehr, 2009; Wang & Shultz, 2010）。

① 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为 65 岁及以下，2009 年实际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为 61.4 岁。部分成员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更低，例如，法国为 60 岁，英国、奥地利、波兰、保加利亚、立陶宛的女性退休年龄也是 60 岁，罗马尼亚的退休年龄为男性 63 岁、女性 58 岁。一些国家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如爱尔兰为 65~66 岁，丹麦为 65~67 岁，瑞典为 61~67 岁，芬兰为 62~68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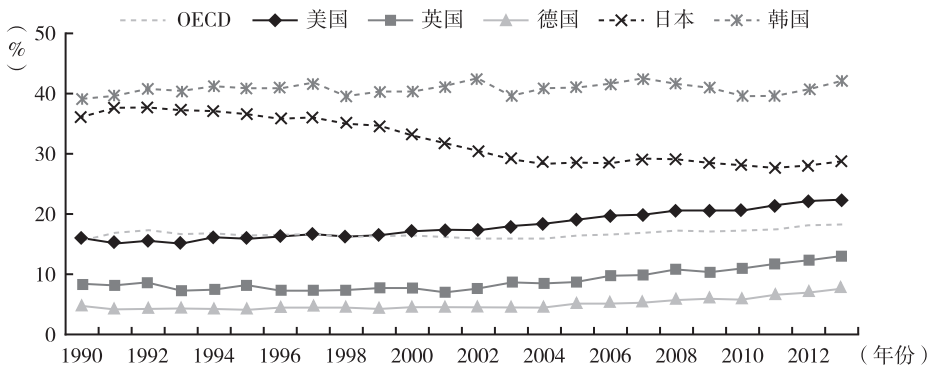


图1 主要国家65岁及以上男性老年人的就业率：1990-2013年

资料来源：OECD Employment and Labour Market Statistics。

中国“退而不休”的劳动者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的特征差异。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老年人是这一群体的主体，根据我们研究估算，60岁及以上农业老年人达到8000万之多，即便65岁及以上农业老年人也达到4000万人。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就业率为20.9%，其中，男性老年人的就业率高达27.4%，高于同期OECD国家平均水平，与美国的就业率相当，中国如此之高的老年人就业率主要来源于农业部门，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特征。更为典型的特征是，中国同样也有一个规模达到1000万人的边享受养老金边工作的群体，而且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是，活跃在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退而不休”劳动者仍然相对年轻，他们当中有大约900万人在65岁以下，超过600万人甚至不到60岁，“银发工作者”显然不能完全恰当地描述他们。

中国“退而不休”劳动者是特定发展阶段与制度转型的结果，背后成因完全不同于一般发达国家。发达国家退休的老年人继续工作的动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需要（Necessity），一部分老年人受到资金预算约束，面临养老金不足和生活成本高企的压力，劳动所得是他们实现体面生活的一个重要激励，但出于生计需要不得不继续工作的老年人并不多。Eurofound（2012）研究表明，欧盟国家中大约仅有五分之一的老年人出于他们需要（Need to do）选择继续工作。美国2008年的一项调查研究也显示，只有18%的人表示他们退休后继续工作是由于从其他渠道获得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Brown et al.，2010）。二是兴趣（Interest），更多的老年人期望通过工作保持与同事、客户乃至社会的紧密联系，能够有机会继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Eurofound（2012）

研究表明，至少五分之三的老年人继续工作仅仅是由于他们想去工作（Want to do），随着老年人的年龄增加，继续工作的内在动力明显增强，而经济方面的外在动力明显减弱（Inceoglu et al. , 2012）。三是机会（Opportunity），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劳动力短缺问题突出，预期寿命不断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人力资本水平在劳动力市场中仍然具有优势，能够比较容易获得就业机会。European Commission（2012）调查表明，42%的欧洲人相信他们有能力在达到65岁以后继续工作，实际情况也表明，退休后继续工作的人几乎很少处在失业风险边缘（Larsen & Pedersen, 2012）。然而，中国的老年人继续工作更多出于直接的经济动因，大多迫于生计而不得不去工作，在当前这样的发展中阶段，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健全，尤其是在农村老年人中的覆盖率很低，养老金也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活跃的“退而不休”劳动者，主要归因于转型过程中不规范的退休制度，他们在年富力强的阶段过早地享受养老金待遇，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创造了良好的就业机会，他们一边享受养老金、一边继续工作获得收入是一个比较理性的状态，可以说是何乐而不为。

“退而不休”现象有利有弊，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倾向于利大于弊，而在中国则负面效应更为突出。退休后继续工作的人是劳动力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经济社会系统运行产生重要影响，在经济调整过程中表现尤为突出（Calasanti & Bonanno, 1992）。尽管发达国家老年人退休后继续工作，可能会占据一部分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但国际经验反复证明这是基于劳动合成谬误（Lump of labor fallacy）的判断，实际上老年人就业增加并非必然影响年轻人就业率（OECD, 2006）。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大多接受过良好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的工作经验，主要从事专业技术或科学技术、健康与社会工作以及农业等行业，有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补充技能型岗位缺口，降低劳动力成本和生产成本，增强经济活力，也有助于平衡养老金账户，缓解政府财政赤字压力（Eurofound, 2012），发达国家总体上倾向于鼓励这一现象。但在中国，尽管“退而不休”劳动者也能够创造价值，但对劳动力市场造成明显的扭曲和效率损失。根据我们研究显示，享受养老金将使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下降28.9%，劳动年龄阶段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下降33.7%，但由于养老金的经济补偿，反而使其总收入要比正常的劳动者高出30%左右，过早地享受养老金抑制了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保留工资，干扰均衡工资的形成机制，扭曲了工资与收入分配格局，背后还潜藏着劳动力供给的挤出效应，城镇中存在劳动力资源闲置和浪费，而农业劳动力的新老更迭被阻碍。

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典型的“双转型”特征，一是从一个农业和农村社会转变成

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二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World Bank, 2013）。中国的“退而不休”现象也正是特定发展阶段与体制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群体特征与成因更为复杂，政策导向自然也不能同一而论。构建与劳动力市场相协调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改革的基本方向，严格规范退休制度，避免在劳动年龄阶段享受养老金，让不该退休的人成为公平竞争的正常劳动者，逐步扩大养老保障覆盖率和保障水平，让应该退休的人有保障地顺利退出劳动力市场。发达国家的经验也值得借鉴，适度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让可以退休但有热情继续工作的人有发挥其价值的机会。

本研究试图尽可能地全景描绘这一典型现象，探讨其特征、成因以及主要影响，但显然依靠一篇论文难以全面详尽，也期望引起相关领域学者的深入探究。后续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界定“退而不休”劳动者的概念与范围，利用微观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数据描述群体特征；第三部分探讨“退而不休”现象的主要成因；第四部分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退而不休”现象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影响；最后部分提出具体的改革方向和政策建议。

二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典型现象：谁是“退而不休”劳动者？

（一）概念界定与数据

理论上，退休者与劳动者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在成熟的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通过就业活动获得收入以满足生活需要，在达到一定年龄（一般是进入到老龄阶段后）开始退出劳动力市场，以养老金维持生活，即从劳动者转变为退休者，一些退休者或是为了兴趣爱好，或是为了改善生活状况，选择继续从事就业活动，但这类群体规模较少，一般并不构成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主体。直到近些年，随着老龄化逐步加深，老年人继续工作的现象逐渐被关注。然而，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长期活跃着一批相当规模的劳动者，他们或是拿着养老金，或是已经成为老年人，但仍然在继续工作，我们将其称之为“退而不休”的劳动者（或者“退休”劳动者），这类群体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和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可能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们首先有必要清楚地界定“退而不休”劳动者的身份。按照图2所示，全体劳动者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尚未退休享受养老金的劳动者；另一类是退休享受养老金的劳动者，他们已经办理退休，正在享受养老金待遇，但仍然从事就业活动并获得劳动收入，即图中的群体C和D。在第一类未退休享受养老金的劳动者中，又可以按

照生命周期中的年龄阶段划分为两类群体，一类是尚处在劳动年龄阶段，即图中的群体 A，另一类是已经进入到老龄阶段（一般定义为 60 岁及以上），即非劳动年龄的劳动者，图中所示为群体 B。其中，群体 D 表示已经进入到老龄阶段并且办理退休享受养老金，仍然继续从事就业活动的人，这部分群体是劳动力和退休制度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通常意义上的“银发工作者”。据此，我们将群体 A 称为正常劳动者，将群体 B + C + D 称为“退而不休”劳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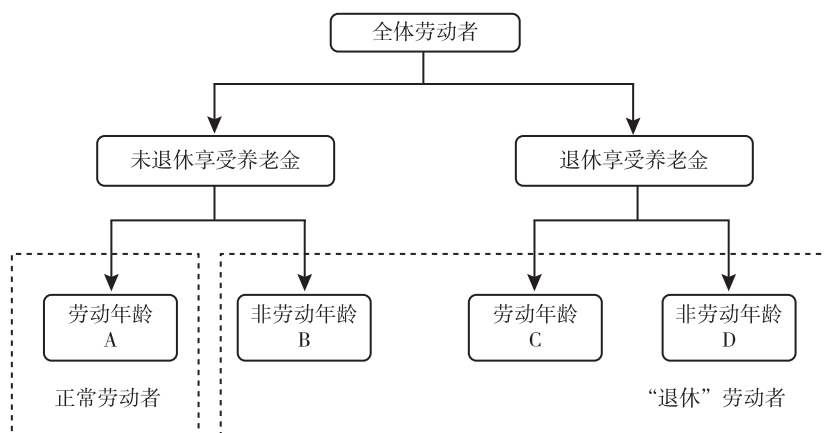


图2 “退而不休”劳动者的基本结构

“退而不休”劳动者是否值得关注和研究，首先要看看这类群体有多大规模，在劳动力市场中扮演何种角色，他们呈现出什么样特征。统计部门目前无法给出宏观上的概况，因此，我们要去了解这类群体的状况必须要用一套合适的调查数据去观测。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于 2011 - 2012 年启动了首次全国基线调查，调查对象以 45 岁以上中老年人为主，调查内容涉及生活、就业、健康等多个方面，调查范围包括全国 150 个县（区）、450 个村（居）的 10257 户城乡家庭、共计 17708 个人，其中，男性和女性分别占到 48% 和 52%，具体样本分布情况见表 1。CHARLS 的调查规范性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样本代表性较强^①，本研究将基于这套微观抽样调查数据来观察中国的“退而不休”现象。

① CHARLS 于 2011 年正式启动，每两年追踪调查一次，数据对学术界公开，调查问卷、抽样过程、调查实施等具体情况可以通过其官方网站了解：<http://charls.ccer.edu.cn/zh-CN>。

表1 CHARLS 调查样本分布情况

	分组	比例(%)
性别结构	女性	52.1
	男性	47.9
年龄结构(岁)	45以下	2.1
	45~49	19.8
	50~54	14.6
	55~59	20.0
	60~64	16.4
	65~69	10.5
	70~74	7.8
	75~79	5.0
	80以上	3.8
户口状况	农业	78.0
	非农业	22.0
婚姻状况	有配偶	87.2
	单身	12.8

注：本文所有的计算过程都进行了加权处理，权重采用基于个体的权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2年全国基线调查计算得到。

（二）结构特征

“退而不休”劳动者需要从年龄阶段、退休状况以及就业状况等几个方面界定。根据 CHARLS 调查数据计算得到，被调查样本中超过劳动年龄（6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占43.5%，其中，男性与女性超过劳动年龄的人口比重分别为45.5%和41.7%。在非农业户口的样本中，已经办理退休开始享受养老金待遇的占到56.1%，在农业户口中这一比例较低，只有12.2%。在就业状况方面，全部样本中目前处于就业的比重约为三分之二（67.6%），这其中，处在劳动年龄阶段的人正在就业的比重占到81.2%，而超过劳动年龄阶段的人仍然在就业的比重占到50.0%。

在全部被调查样本的劳动者中，超过劳动年龄、未退休享受养老金的比例占23.3%，超过劳动年龄、且退休享受养老金的比例为8.9%，仍处在劳动年龄、但又办理退休享受养老金的比例占2.7%，B+C+D合计为“退而不休”劳动者，占全部劳动者比例达到34.9%（见表2）。这意味着“退而不休”劳动者已经占到中国45岁及以上劳动者的三分之一还多，大约相当于全国就业人员总量的12%左右，规模如此庞大的群体显然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表 2 “退而不休”劳动者的总体结构

单位：%

	劳动年龄	超过劳动年龄
未退休享受养老金	65.1(A)	23.3(B)
退休享受养老金	2.7(C)	8.9(D)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2年全国基线调查计算得到。

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的“退而不休”劳动者占总体劳动者比重分别为 35.2% 和 33.2%（见图 3），两者相差不大，但是在群体构成上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在农业劳动者中^①，超过劳动年龄、未退休享受养老金的比例占到 25.9%，即群体 B 是农业“退而不休”劳动者的主要构成，贡献了大约四分之三，而群体 C 处在劳动年龄阶段、退休享受养老金的劳动者只有 1.1%。在非农劳动者中，群体 B 的贡献则相对最小，只占到非农劳动者的 6.0%，对非农“退而不休”劳动者贡献了不到五分之一，而群体 C 和 D 则分别占到 13.3% 和 13.8%，即享受养老金、仍然在继续工作的人占到“退而不休”劳动者约八成。农业与非农业“退而不休”劳动者的构成存在如此明显差异，我们自然会去思考其形成原因，在研究中有必要将农业与非农业区别开来。

（三）群体特征

从城乡区域划分来看，“退而不休”劳动力占总体劳动者比重存在差异，农村地区明显要高于镇和城市。根据测算结果显示，农村地区的“退而不休”劳动者占调查样本劳动者比重为 36.2%，镇和城市分别为 32.9% 和 25.6%。在农村地区，男性劳动者中的“退而不休”劳动者比重要高于女性，但在城市中恰恰相反，女性劳动者中的“退而不休”劳动者比重则更高（见图 4）。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退而不休”劳动者比例越高，不管在农村还是城镇地区，小学及以下的劳动者中“退而不休”劳动者比重均超过 30%（见图 5），而初中或高中这一比例不到 20%，但似乎受教育程度更高（大学及以上）的劳动者中“退而不休”劳动者比例又有所上升，尤其是城镇地区表现较为明显，背后原因有待进一步观察。

城乡“退而不休”劳动者的年龄分布特征差异明显。其中，农业劳动者主要集中

^① 这里的农业劳动者与非农业劳动者按照户口类型划分，并非按照实际职业类型划分，农业户口的劳动者可能并不完全从事农业就业，也不完全居住生活在农村。当然，对于 45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来说，这类情况要比年轻人少很多。因此，一般情况下，本文没有在概念上再进行区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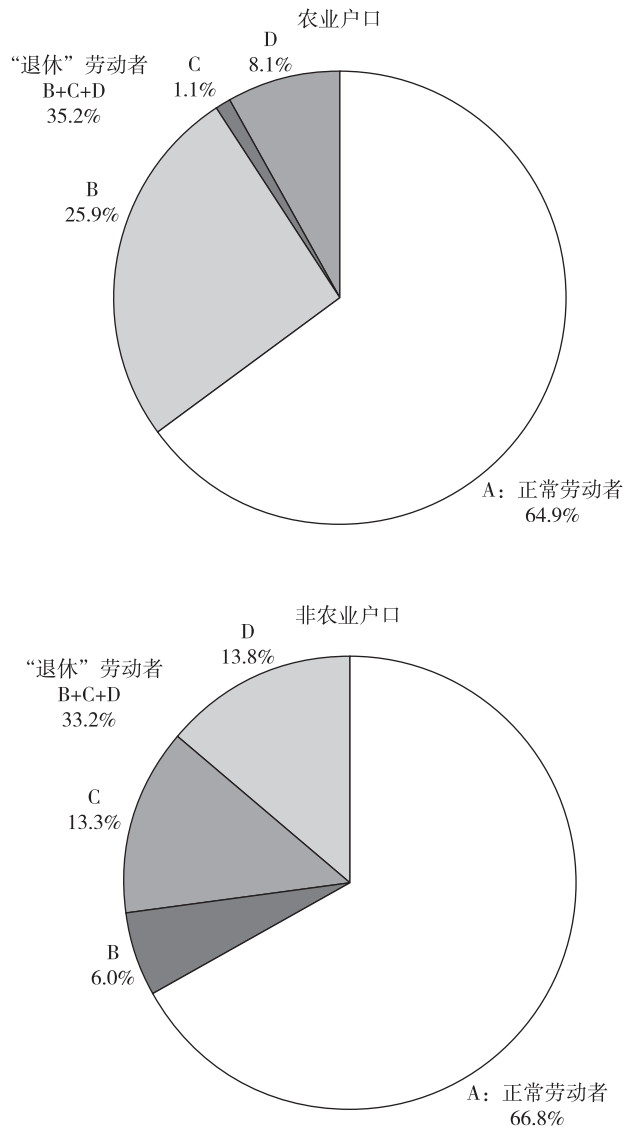


图3 农业与非农业户口中的“退而不休”劳动者构成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2年全国基线调查计算得到。

在60岁及以上的老龄群体中，分布图呈现出右偏的特征，而非农劳动者主要集中在50~69岁之间，呈现出更为明显的正态分布特征（见图6）。这一年龄分布特征差异与前面“退而不休”劳动者的构成差异特征基本吻合，农业“退而不休”劳动者主要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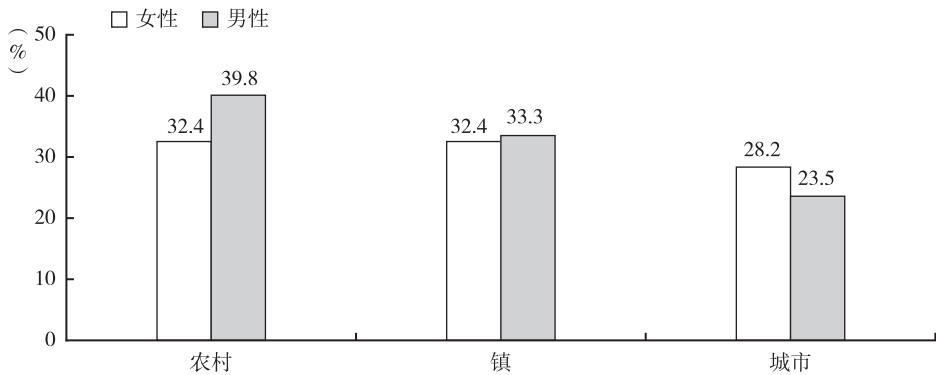


图4 “退而不休”劳动者占全部劳动者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2年全国基线调查计算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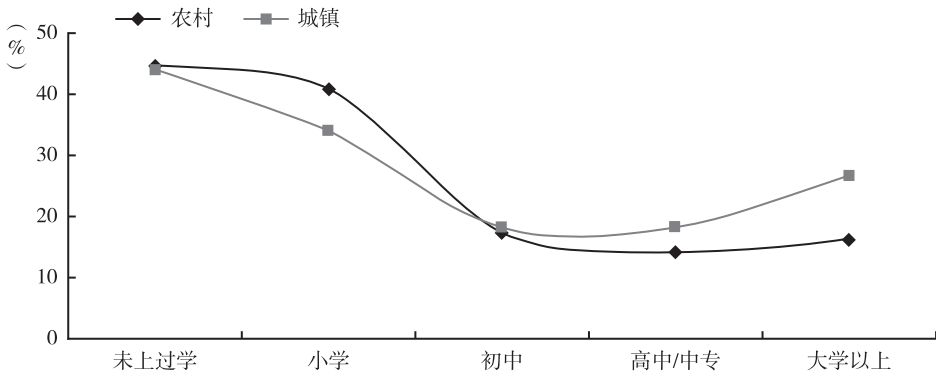


图5 不同教育程度“退而不休”劳动者占全部劳动者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2年全国基线调查计算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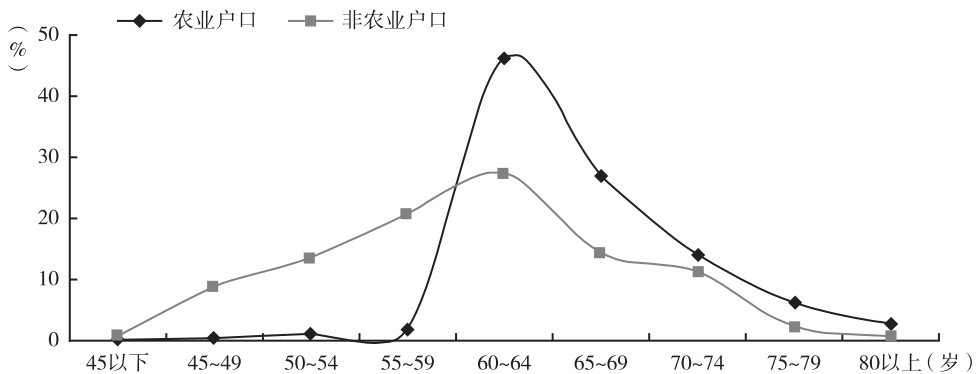


图6 “退而不休”劳动者的年龄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2年全国基线调查计算得到。

超过劳动年龄、未退休享受养老金的群体构成，而非农“退而不休”劳动者则主要由享受养老金、仍然在继续工作的群体构成，并没有特殊的年龄阶段特征，这也再次说明城乡“退而不休”劳动者之间的特征差异很大，也为我们探索其背后的形成机理和根源留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四) 总量估算

在了解“退而不休”劳动者的基本结构特征基础上，我们自然会感兴趣目前全国这类群体究竟有多大规模。我们尝试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作为劳动力总量指标，以 CHARLS 调查计算结果作为结构指标，估算出每一个年龄的劳动力总量及其不同类型劳动力数量，然后加总推算出这一群体总量以及城乡、年龄组分布。

根据估算表明，目前中国“退而不休”劳动者的总规模为 9819 万人，已经将近 1 亿人，其中，农业劳动者超过 8400 万人，非农劳动者大约 1400 万人，农业“退而不休”劳动者中群体 B（超过劳动年龄、未享受养老金的劳动者）规模最大，超过 6200 万人，非农“退而不休”劳动者中群体 C（处于劳动年龄、享受养老金的劳动者）规模最大，超过 640 万人（见表 3）。我们同时估算出不同年龄组的规模（见表 4），农业“退而不休”劳动者中 60~64 岁之间的数量超过 3600 万人，非农“退而不休”劳动者中 55~59 岁与 60~64 岁之间的数量基本相当，均接近 300 万人。

表 3 “退而不休”劳动者的总量估算

单位：万人

	类型	总体	农业户口	非农业户口
正常劳动者	A: 劳动年龄、未享受养老金	21149	18288	2862
“退休”劳动者	B: 超过劳动年龄、未享受养老金	6416	6216	200
	C: 劳动年龄、享受养老金	978	335	643
	D: 超过劳动年龄、享受养老金	2425	1904	521

资料来源：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年龄汇总数据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2 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表 4 不同年龄组的“退而不休”劳动者数量

单位：万人

年龄组(岁)	总体	农业户口	非农业户口
45~49	185	63	122
50~54	342	117	225
55~59	450	154	296

续表

年龄组(岁)	总体	农业户口	非农业户口
60~64	3981	3682	299
65~69	2512	2294	217
70~74	1381	1254	127
75~79	670	616	54
80以上	298	274	25
合 计	9819	8455	1364

资料来源：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年龄汇总数据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2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三 后顾之忧还是年富力强：他们为何“退而不休”？

按照劳动经济学理论，理性个体根据收入与闲暇的效用最大化来决定是否参与劳动，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工作的基本动机就是挣钱以满足生活需要，尤其是在青壮年时期可谓年富力强，人力资本水平通常处在最佳时期，工资收入比较高，劳动参与率也很高。随着进入到中老年阶段，生命周期特征决定了继续工作的负效应开始增强，倾向于减少劳动时间或退出劳动力市场，以养老金或储蓄维持生活需要。

对于处在这一阶段仍然选择继续工作的人，我们自然会去想，他们很可能是因为养老金缺乏或者不足，不工作就无法生存或者达不到预期生活水平，后顾之忧迫使其不得不继续工作；或者是因为他们仍然年富力强，在劳动力市场中仍然有竞争优势，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就业机会，挣得工资收入加上养老金能够实现其更高的生活水平。当然，也有可能他们根本就不缺钱，纯粹为了兴趣爱好、消磨闲暇时光或者体现自我价值，但这类群体在发展中国家来说应该不会太普遍。城乡“退而不休”劳动者之间的特征差异明显，我们将分别去探索其“退而不休”的背后动因。

（一）农业“退而不休”劳动者：不得已而为之

养老金缺乏导致农业劳动者不得不依靠劳动收入满足生活需求。根据 CHARLS 调查显示（见图7），45岁及以上的农业劳动者中享受养老金待遇的比例（近似为养老金覆盖率）平均只有12.0%，即便在60岁以上的农业劳动者中，养老金覆盖率也只有不到30%，女性的养老金覆盖率则更低。对比城镇的非农劳动者，农业劳动者的养老保障明显不足，非农劳动者的养老金覆盖率平均达到57.3%，进入到老龄阶段之后，养

老金覆盖率提高到80%左右，特别是男性非农劳动者的覆盖率超过90%。超过七成的农业劳动者在进入老龄阶段之后，无法享受到一分钱的养老金，在自己储蓄和家庭供养不足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选择继续从事劳动。2000年一项农户抽样调查显示（庞丽华等，2003），农村老年人只有3%的人享受养老金，而且养老金平均每月不足100元，50~59岁的劳动参与率超过90%，60~69岁的劳动参与率接近70%，缺乏社会养老保障机制，农村老人只能通过继续劳动实现自我养老。研究表明，超过劳动年龄、未退休享受养老金的群体B占到农业“退而不休”劳动者的四分之三，养老金的低覆盖率基本上解释了6200万此类群体存在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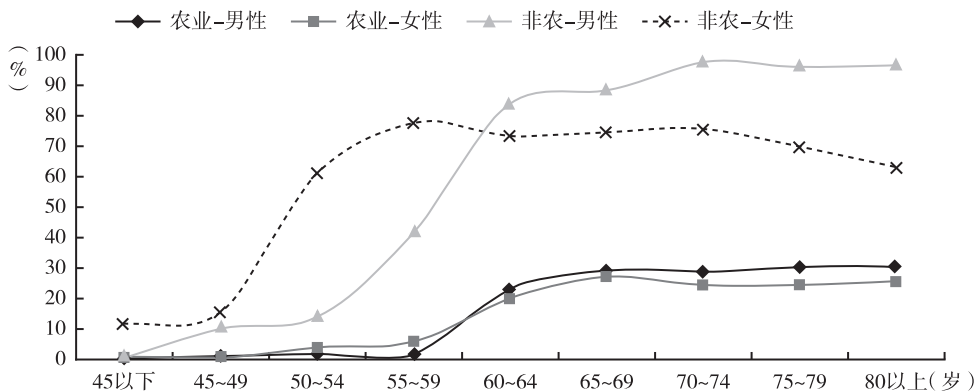


图7 城乡养老金覆盖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2年全国基线调查计算得到。

即便是能够享受养老金的农业劳动者，较低的养老金水平可能使其无法保障正常生活。调查显示（见图8），农业劳动者的养老金平均不到3000元/年，而非农劳动者的养老金平均达到20000元/年，大约是农业劳动者的7倍；按照收入替代率（平均养老金占平均收入的比重）来看，农业与非农业的平均替代率分别为33%和94%。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进入到老龄阶段之后，农业的养老金水平趋于下降，而非农的养老金则趋于提高，两者养老金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主要由于60岁之前较早办理退休的农业劳动者并非享受的是一般农村养老保险，而是特定职业的退休金（如农村教师、乡镇企业或集体企业等），若仅考虑覆盖面更广的农村养老保险（2009年开始全国试点实施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养老金水平则更低。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公布数据，2013年平均养老金水平仅为81元/月，即972元/年，仅相当于当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的10.9%，难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经过连续

十多年提高城镇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大约每年按照 10% 的幅度增长，2013 年全国城镇企业退休人员的平均养老金水平已经达到 1900 元/月左右，城乡养老金水平有进一步拉大趋势，养老金对于城镇人口的生活保障功能逐渐增强，而对于农村人口的生活保障功能则尚未充分发挥。养老金不足基本可以解释农业“退而不休”劳动者的另外四分之一群体，即大约 1900 万超过劳动年龄、享受养老金的群体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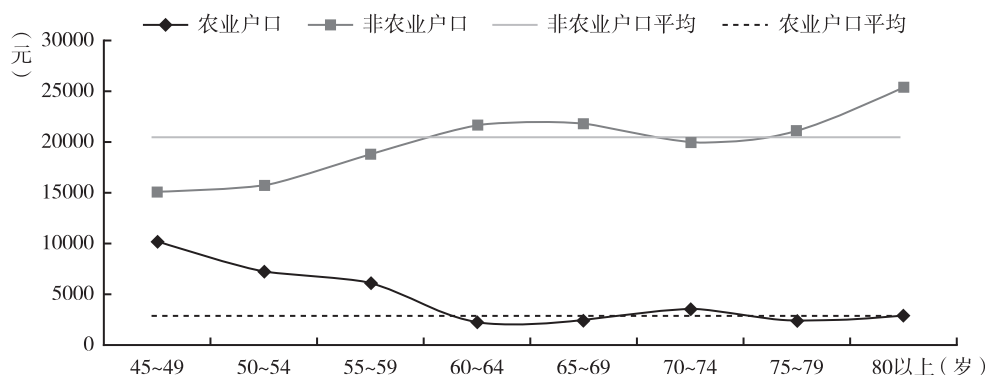


图 8 城乡养老金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2 年全国基线调查计算得到。

对于农业“退而不休”劳动者大规模存在的现象，我们应该比较容易理解。中国是一个二元经济特征明显的发展中国家，农村老年人曾经在较长时期里呈现出“无休止劳动（Ceaseless toil）”的现象（Davis-Friedmann, 1991；Benjamin et al., 2003），显然不能用他们的偏好（如对农业的热爱和感情）来解释，更主要原因仍然在于生计需要，养老金不足或是根本就没有养老金，传统意义上安享晚年的条件尚不成熟。为了解决生存的后顾之忧，他们不得不去继续工作，直到力不从心为止，可谓不得已而为之。

（二）非农“退而不休”劳动者：何乐而不为

不同于农业劳动者，城镇劳动者的养老金覆盖率明显更高，那么，为何他们还有这么多人选择继续工作而不退出劳动力市场呢？是因为养老金水平不足吗？根据前面调查结果来看，似乎这也不能完全成立，非农的平均养老金水平已经超过 20000 元/年，而且最近年份城镇养老金水平还在保持持续提高的趋势，调查得到的平均养老金收入替代率甚至接近 100%，一般逻辑上来说，目前的养老保障水平应该可以基本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那么，他们究竟为何还要继续活跃在劳动力市场中呢？

我们首先可能会想到，尽管总体养老金水平已经不低，是否因为养老金水平存在差异呢？是否因为继续参加劳动的人享受的养老金水平要比选择直接退休的人更低呢？根据 CHARLS 数据描绘的养老金水平分布图（见图 9），这一猜测似乎并不能成立。“退而不休”劳动者与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非就业人员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养老金水平差距，两者的养老金水平分布趋势基本相似，平均养老金水平分别为 19113 元和 20707 元。如此之小的养老金差距应该不足以对其基本生活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足以成为其继续工作的关键激励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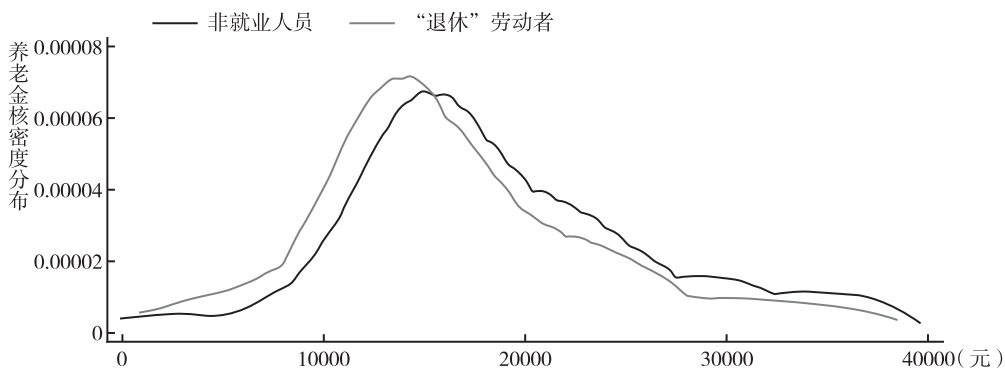


图 9 城镇“退而不休”劳动者与非就业人员养老金水平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2 年全国基线调查计算得到。

既然不是养老金不足的问题，那么，有必要去看看动因是否出自拿养老金的人身上，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拿着并不少的养老金，而又继续在工作挣钱呢？我们尝试从享受养老金人员的年龄结构上去观察，对比其中的劳动者与非就业人员可以看出（见图 10），一边拿着养老金、一边工作的人明显更加年轻，60 岁以下尚处在劳动年龄阶段的比例高达 62.3%，而选择享受养老金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员当中则超过 70% 已经处在老龄阶段。从前面城乡养老金覆盖率状况也可以提供类似证据，60 岁之前城镇人员的养老金覆盖率已经达到相当水平，尤其是女性更为明显，50~59 岁之间的女性养老金覆盖率已经超过 60%。但是，他们尚处在生命周期的活跃阶段，仍然可以称得上年富力强的，在劳动力市场中保持着较好的竞争力，尤其在最近年份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意味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蔡昉，2010b），供求关系出现明显转变，普通劳动者工资出现持续快速上涨，劳动力短缺和“用工荒”已经不是偶然或局部现象（蔡昉、都阳，2011）。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在灵

活的市场中得到就业机会，一边领着养老金，能够保证基本生活，一边工作拿着工资，可以提高生活水平或者补贴家庭，何乐而不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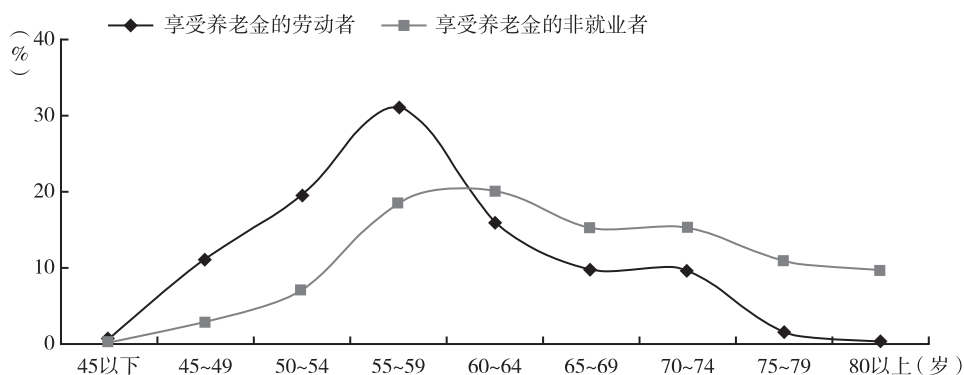


图 10 城镇享受养老金人员的年龄结构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2年全国基线调查计算得到。

对于将近 650 万处在劳动年龄、享受养老金的群体 C，他们之所以存在的主要原因并非养老金不足，只能说他们还比较年轻，既能够从劳动力市场中找到合适位置，同时目前的劳动力市场又很需要他们。我们不禁要去问，为何他们能够如此之早地拿到养老金，以致成为非农“退而不休”劳动者的最大贡献者？这需要追溯到中国改革尚未完成的退休制度。尽管按照相关制度规定，男性法定退休年龄为 60 岁，女性中干部为 55 岁、普通工人为 50 岁，同时允许一些特殊职业和群体（如煤矿井下矿工）提前办理退休，但实际操作中，为了配合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启动的国有企事业单位改制，很多地方和部门通过提前办理退休的措施（如“内退”可以最长提前法定退休年龄五年办理）以加快改制进度。政府在改革初期不鼓励国有企业将富余人员直接推向劳动力市场，非常普遍的强制或鼓励职工提前退休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下岗与失业安排，造成了大量的“隐性失业”（蔡昉、王美艳，2004），政府也倾向于通过发放养老金补贴以缓解几千万下岗职工引发的社会矛盾，养老保险制度丧失了必要的独立性，从属于经济相关领域改革。观察当年国企改制下岗职工的年龄，他们大部分都处在生命周期中的黄金阶段，接近 80% 都在 45 岁以下^①。提前退休被视为企业减员增效的一种措

^①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形势严峻的 1999 年，全部 708 万下岗职工中，年龄在 34 岁及以下的占 35%，35~45 岁之间的占 43%，46 岁及以上的仅占 22%（蔡昉、王美艳，2004）。可见，即便十几年后的今天，他们当中有很大部分仍然处在劳动年龄阶段，有条件继续从事就业活动。

施,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不规范早退现象。1998年23个省份新增企业退休人员133万人,以病退、特殊工种等为由违反规定提前退休的达到28万人,约占20%,新疆、黑龙江等省份违规提前退休的比例甚至高达50%(李红岚、武玉宁,2000)。法定退休年龄从建国初期制定后一直未作大幅调整,已经与目前的预期寿命不符合^①,而制度操作的不规范又进一步提前了实际退休年龄,根据人力资源部与社会保障部官方公布数据,目前中国平均的实际退休年龄只有53岁。根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2000-2006年间女性不到50岁就退休的比例占到30%,男性不到55岁就退休的比例占到22%(封进、胡岩,2008)。在体制转轨初期,破除了“大锅饭”,原本最低工资较高、单位工资和最低劳动时间较低的格局被打破,畸高的劳动参与率一度开始下降(陆铭、葛苏勤,2000),一些竞争力不足的人选择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甚至出现了“沮丧的工人效应”(蔡昉,2007)^②。随着劳动力市场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劳动力供求结构发生根本性逆转,目前这种现象已经逐渐消失殆尽,“隐性失业”人员有条件转变为完全的就业者。因此,体制转轨过程中不完善的退休制度促成了大量提前退休人员出现,但他们很多人并未真正永久退出劳动力市场,从而形成了群体如此庞大的“退而不休”劳动者。

520万进入老龄阶段、享受养老金的群体D是非农“退而不休”劳动者另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他们同样享受着养老金仍然在持续工作,而且,他们已经并不年轻。城镇劳动力市场中有这么大规模的此类群体,更是让人觉得惊叹。相对来说,群体C比起群体D更容易理解,至少前者更年轻、具备就业能力方面的优势,而后者让我们感到更加困惑。这里我们难以给出全面的答案,但我们仍然可以按照类似的逻辑去推测和讨论。首先,是否因为老年人之间的养老金水平存在差异,迫使部分人继续去工作呢?我们比较了老龄阶段的劳动者与非就业人员之间的养老金水平,的确他们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劳动者的平均养老金水平为18670元/年,要比非就业人员的养老金水平(22030元/年)低15%左右,养老金差距可能是他们劳动决策的影响因素^③,但如

① 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10年中国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4.8岁,男性与女性分别为72.4岁和77.4岁。

② “沮丧的工人效应”反映了因为就业形势不好,一些长期失业、寻找工作有困难的经济活动人口逐渐失去了就业信心,不得已退出劳动力行列,在国企改制初期的确存在此种情况。

③ 在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和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初期,社会养老负担很重,养老金水平较低,退休后继续工作的老年人的确有很大一部分是主要出于经济因素。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1997年开展的“老年人再就业调查”显示,56%的退休职工为了补充家计生活选择再就业,70%的人从事着与其原来职业不同的工作(张翼、李江英,2000)。

此差距应该不足以成为其劳动决策的主要、更非唯一的决定因素。其次，尽管他们不再年轻，但身体状况上具备良好条件，能够达到就业要求。调查显示，这类群体的健康状况明显要好于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90%左右身体状况良好，过去一个月去过医院看病的比例只有15%。除了健康状况之外，我们也观察了人力资本状况，但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差异，受教育水平高低似乎与老年人参与劳动决策无关。这背后也可能涉及目前劳动力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低技能、非熟练普通劳动力的短缺已经成为不争事实，不同于国有企事业单位改制初期，中老年人通过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找到就业机会的概率增大，尤其健康状况较差、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人面临更高的失业风险，倾向于尽早办理退休享受养老保障（封进、胡岩，2008）。再次，我们想到家庭结构和代际转移可能是他们选择继续工作的因素，在身体条件允许情况下，通过劳动获得收入以补贴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也比较符合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当然，究竟哪些因素影响这类老年人的劳动决策，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群体C和D构成的享受养老金、仍然继续工作的人约占到非农“退而不休”劳动者的80%，基本上解释了非农“退而不休”现象存在之原因。除此之外，还有约200万超过劳动年龄、但未被养老金覆盖的群体B占非农“退而不休”劳动者的五分之一左右。这类群体类似于农业“退而不休”劳动者的主要构成，相对比较容易理解，养老金缺失是主要原因，他们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继续工作。总体上来说，退休与养老制度问题是非农“退而不休”劳动者大规模出现的主要原因，但并非是由于养老金缺失或不足，而恰恰是因为他们能够过早地享受养老金，这正是退休制度不完善的结果。在自身年富力强、劳动力市场环境良好的情况下，他们一边享受养老金、一边继续工作获得工资收入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四 供给增加还是效率扭曲：他们带来何种影响？

从表层或者字面意义上，“退而不休”劳动者就是可以退休但仍然在继续工作的人，这类群体扩大似乎对劳动力市场来说是一个好事，劳动供给增加总体来说是长期经济扩张的重要条件。但是，如果增加的供给是以牺牲效率为前提的话，那么，究竟是否有利于劳动力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则需要谨慎讨论了。

（一）保留工资的抑制效应

“退而不休”劳动者与正常劳动者特征差异明显，我们自然会对他们在劳动力市场

中的表现感兴趣。我们通过观察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即便在同等条件下，“退而不休”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要普遍地低于正常劳动者。

对比城镇不同类型的劳动者工资水平，正常劳动者（群体 A）的平均工资超过 2.5 万元/年，而各类“退而不休”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在 1.6~2.2 万元/年之间，其中，处在劳动年龄并享受养老金的劳动者（群体 C）平均工资仅为 1.6 万元/年（见表 5），比正常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低 35% 左右。男性与女性劳动者均表现出类似特征。城镇劳动者中群体 A 与群体 C 的工资水平分布图（见图 11）更清晰地呈现，“退而不休”劳动者相对于正常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明显更低。

表 5 城镇不同类型劳动者的工资与收入水平

单位：元/年

类型	工资水平			收入水平		
	女性	男性	总体	女性	男性	总体
A: 劳动年龄、未享受养老金	20776	27682	25431	24069	29479	27713
B: 超过劳动年龄、未享受养老金	14400	21651	21343	14400	27367	26817
C: 劳动年龄、享受养老金	15330	18132	16432	39468	30882	36090
D: 超过劳动年龄、享受养老金	13006	20447	19677	27381	38795	37588
合计	19546	26349	24037	27177	30148	2913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2 年全国基线调查计算得到。

这是由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原因为？我们首先观察了城镇“退而不休”劳动者与正常劳动者的教育水平结构。的确，正常劳动者尚处在劳动年龄阶段，高中/中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超过 50%，受教育程度自然要高于已经处于老年阶段的劳动者，但是处在同一年龄阶段的“退而不休”劳动者（群体 C）的人力资本水平并没有表现出明显劣势，高中/中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也超过 45%。进一步对比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工资水平（见图 12），即便在相同的人力资本水平状况下，享受养老金的劳动者工资水平同样也低于未享受养老金的劳动者，尤其在高中/中专、大学及以上的较高人力资本水平情况下表现更为突出，显然，人力资本不能完全解释“退而不休”劳动者的低工资现象。

养老金对于保留工资的抑制效应是关键原因。享受养老金的“退而不休”劳动者相当于获得了一定额度的转移支付，能够接受相对更低的保留工资，这将会改变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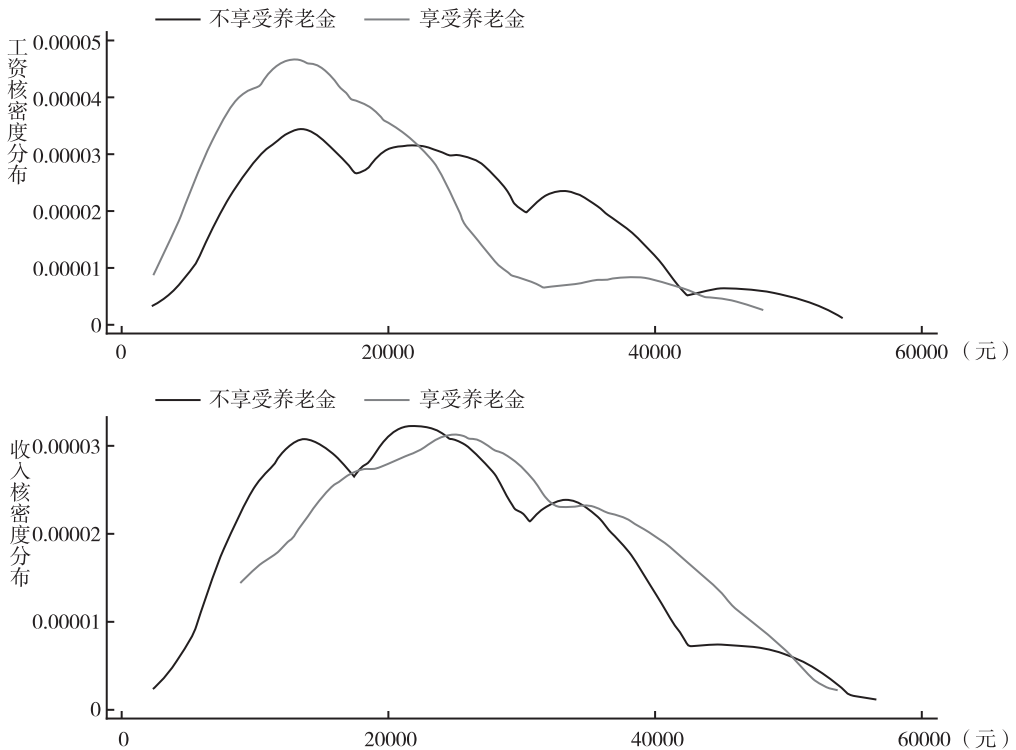


图 11 城镇劳动年龄劳动者的工资与收入分布

注：上图为工资水平分布，下图为收入水平分布；城镇劳动年龄中不享受养老金与享受养老金两类群体即为本文所指的劳动者中的群体 A 与群体 C。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 - 2012 年全国基线调查计算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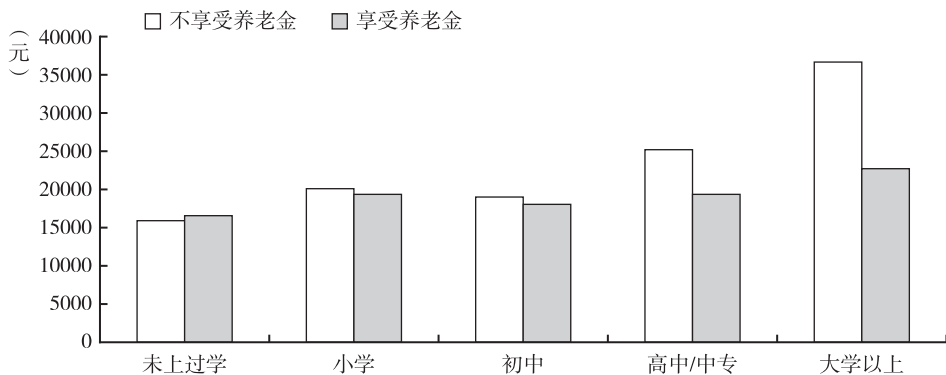


图 12 不同教育程度的城镇劳动者工资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 - 2012 年全国基线调查计算得到。

力市场中均衡工资水平形成机制，倾向于压低均衡工资水平。我们基于经典的 Mincer (1974) 工资方程 (见表6)^①，检验养老金覆盖对于城镇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抑制效应，被解释变量为工资收入的对数，在控制了教育水平、工作年限、性别、婚姻、健康等因素后，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养老金覆盖显著地降低了劳动者工资水平，在总体样本中，被养老金覆盖将使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下降 28.9%，这种工资抑制效应在劳动年龄阶段表现尤为突出，被养老金覆盖将导致工资水平下降 33.7%，养老金的保留工资抑制效应造成了“退而不休”劳动者低工资现象。

表 6 养老金覆盖对工资水平的抑制效应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劳动年龄阶段	非劳动年龄阶段	总体
养老金覆盖(0 = 是, 1 = 否)	-0.337 *** (0.061)	-0.020 (0.250)	-0.289 *** (0.062)
教育年限	-0.070 *** (0.021)	0.010 (0.080)	-0.039 ** (0.020)
教育年限平方	0.008 *** (0.001)	-0.002 (0.005)	0.006 *** (0.001)
工作经验	0.092 *** (0.034)	0.254 (0.171)	0.026 *** (0.020)
工作经验平方	-0.001 *** (0.000)	-0.002 (0.002)	0.000 (0.000)
性别(0 = 女, 1 = 男)	0.240 *** (0.045)	0.059 (0.263)	0.224 *** (0.048)
婚姻(0 = 无配偶, 1 = 有配偶)	0.237 *** (0.083)	-0.425 (0.379)	0.142 * (0.088)
健康状况 = 较差(很差为参照组)	-0.370 (0.308)	-0.537 (0.802)	-0.339 (0.286)
健康状况 = 一般	-0.107 (0.297)	-0.121 (0.771)	-0.038 (0.276)

① 经验研究中 Mincer 工资方程采用半对数函数形式： $\ln(Y_i) = \alpha_0 + \beta_1 S_i + \gamma_1 E_i + \gamma_2 E_i^2 + \varepsilon_i$ ，其中， Y_i 表示个人工资收入， S_i 表示受教育程度， E_i 表示工作经验。经验研究中，学者们经常在此基础上根据研究需要进行扩展，我们的实证模型中加入了 S_i 的二次项以及其他控制变量，教育程度用受教育年限表示，工作经验用实际年龄减去教育年限再减去学前年数（6 年）来近似衡量，在缺乏具体的工作经验指标情况下学者们习惯采用此种方法替代（如王美艳，2009）。

续表

解释变量	劳动年龄阶段	非劳动年龄阶段	总体
健康状况 = 较好	0.068 (0.298)	0.019 (0.787)	0.123 (0.277)
健康状况 = 很好	0.136 (0.301)	0.147 (0.846)	0.189 (0.282)
常数项	7.723 *** (0.680)	3.193 *** (4.663)	8.800 *** (0.491)
R ²	0.28	0.07	0.20
样本量	691	112	803

注：括号里数值表示标准误，***、**、* 分别表示模型估计系数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 - 2012 年全国基线调查计算得到。

但是，“低工资”并不意味着“低收入”。尽管“退而不休”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要低于正常劳动者，但包含养老金、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在内的总收入并不比正常劳动者低（见表 5），群体 C 的平均工资水平比正常劳动者低 35%，而平均总收入反而比正常劳动者高 30%，养老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经济补偿作用。如果没有养老金的经济补偿，“退而不休”劳动者在同等情况下，必然会要求与正常劳动者得到基本一致的工资水平，以保证总收入达到预期，保留工资也会相应提高，这从另一个侧面再次验证了养老金的工资抑制效应。

这种抑制效应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对于劳动力需求方（用人单位）来说，自然是件好事，劳动力成本下降，用工压力得到缓解，相当于得到了转移支付的劳动力成本补贴。但是，对于劳动力供给方来说显然不是好事，“退而不休”劳动者的保留工资被压低，均衡工资水平被扭曲，没有享受到养老金的正常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导致一种不公平竞争状态，尤其在就业形势出现问题时更容易遭受冲击。更为严重的是，对于整体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将会产生负面影响，相同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者并没有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相近的工资水平，背后必然有劳动力市场扭曲的作用，劳动力资源没有实现有效配置，从而阻碍劳动力市场效率改进。近些年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劳动生产率步伐，可能也有此种原因。

（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效应

养老金通过抑制“退而不休”劳动者的保留工资，造成劳动力市场扭曲，将会进一步反映到工资与收入分配格局上。回顾国际经验可以形成一个共识，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形成制度对一个国家内部甚至国别间的收入分配有重大影响（Freeman, 2008）。

前面的观察分析表明,享受养老金的“退而不休”劳动者与正常劳动者之间的工资水平差距并不仅仅来源于人力资本,养老金制度也是重要因素之一。那么,究竟养老金制度对工资与收入不平等带来了多大影响呢?

养老金对于劳动力市场工资差距的影响已经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利用基于回归方程的 Shapley 值分解方法 (Shorrocks, 1999)^①,观察养老金覆盖对于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工资差距的贡献,结果显示(表7),除了教育、健康反映的人力资本所决定的工资差距之外(大约可以解释70%的不平等),养老金覆盖对于工资差距的贡献份额也比较“可观”,在总体样本与劳动年龄阶段分别为7.12%和6.11%,影响程度仅次于性别差异,甚至高于反映工作经验的年龄。可以说,退休制度产生的“退而不休”劳动者已经成为工资差距扩大的推动力量,我们在探讨工资与收入分配这一重要议题中应该予以关注。

表7 城镇劳动者的工资差距来源:基于 Shapley 值分解

解释变量	总体		劳动年龄阶段	
	Shapley 值	贡献份额(%)	Shapley 值	贡献份额(%)
养老金	4.09	7.12	3.32	6.11
教育	31.67	55.18	29.89	55.02
性别	8.49	14.79	9.63	17.73
年龄	0.97	1.70	0.49	0.90
婚姻	1.97	3.44	3.28	6.04
健康	10.20	17.77	7.72	14.21
合计	57.39	100.00	54.34	100.0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2年全国基线调查计算得到。

养老金收入既通过抑制保留工资水平影响劳动者的工资差距,同时又通过转移支付作为收入的重要构成影响总体收入差距。我们采用分项收入基尼系数分解方法(Shorrocks, 1980)^②,观察城镇劳动者总收入不平等的构成(见表8)。在总体样本中,

- ① Shorrocks (1999)发展的基于回归的收入不平等分解方法被广泛应用,基本分为两个步骤:首先设定一个收入决定方程,估计出各个自变量的系数,然后将收入不平等的计算指标运用到该方程的两端,得到各自变量对于不平等指标的贡献度。实际应用中,使用半对数模型可以回避常数项是否对收入差距有贡献的争议。
- ② 只要总收入与分项收入是可加总的,就可以按照收入构成进行不平等分解,通常使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不平等以便进行分解: $G(Y) = \sum_i E(Y_i)/E(Y)C(Y_i)$, G 表示基尼系数, E 表示均值, C 表示集中系数,与基尼系数计算基本一样,总量基尼系数是分项变量集中系数的加权平均,权数为分项变量在总量中的比例。万广华(2006)对不平等的度量和分解方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养老金收入贡献了 38.1%，甚至已经超过工资性收入成为不平等的最主要来源，即便处在劳动年龄阶段的劳动者，养老金收入对于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份额也达到 10%，过早地享受养老金待遇不仅扭曲劳动力市场的效率，也产生了负面的收入分配效应，加剧了劳动者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回到前面图 11 中，我们再去观察这一奇特现象，享受养老金的劳动者工资水平明显比正常劳动者低，而总收入却比正常劳动者更高，背后故事似乎愈加清晰，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扭曲效应。

表 8 城镇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构成：基于基尼系数分解

	总体	劳动年龄阶段	非劳动年龄阶段
养老金收入(%)	38.1	10.2	66.0
工资性收入(%)	36.3	59.8	12.5
经营性收入(%)	23.2	26.8	19.8
转移性收入(%)	2.5	3.2	1.8
总收入基尼系数	0.43	0.44	0.41

注：个人总收入中不包括家庭财产性收入。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2 年全国基线调查计算得到。

扭曲效应导致的收入不平等自然没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人力资本水平造成的工资与收入差距是合理的，能够被劳动者和社会大众所接受，这种差距也正是劳动力市场效率的表现和重要动力。但是，由于养老金制度因素造成的工资差距，则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扭曲，也不能够被社会大众所接受，这种不平等应该优先消除。如果消除养老金制度造成的影响，这类群体的工资差距能够下降 6%~7%，总收入不平等也会显著下降。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普通劳动者工资快速上涨，总体工资差距有缩小迹象（蔡昉、都阳，2011），若能够进一步消除制度因素造成的工资扭曲与不平等，将有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更早地迎来“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到来。

（三）劳动供给的挤出效应

尽管“退而不休”劳动者已经占有相当规模，成为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首先，与这类劳动者具有相同特征的人有很大部分选择了直接退出劳动力市场，他们在年富力强之时就享受着养老金，在衣食无忧情况下更倾向于闲暇带来的效用，甚至可能出现“养懒汉”现象。理论上，养老保障可以放松预算约束，提高当期或预期的收入水平，降低劳动或储蓄动机，尤其对于即将退休和已经退休的中老年人，养老保障具有劳动供给的挤出效应，激励他

们更早地退出劳动力市场。美国的劳动参与率（尤其是中老年人）在20世纪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持续下降，欧洲国家劳动参与率在最近几十年也表现出下降趋势，社会保障制度被认为是劳动参与率长期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Andrew, 1998; Santos & Ferreira, 2004; Martín, 2010）。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养老金是三分之一南非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Bertrand et al. (2003) 研究发现生活在有养老金的家庭中，家庭成员的劳动参与率明显较低。在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中，一群尚处在劳动年龄的人原本应该、也有条件继续为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增长创造活力，但由于能够较早地享受养老金而失去了就业激励，如果这种劳动供给的挤出效应确实存在并且比较突出，显然将会造成人力资源闲置和浪费。

其次，与前一种情况恰恰相反，已经进入到老年阶段的劳动者由于缺乏养老保障而不得不继续劳动，而实际上他们可能由于人力资本折旧已经不具有明显的生产效率优势，对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显然也不是好事，这类群体主要集中在农业中。如果养老金对于这类群体也能够产生劳动供给的挤出效应，那么，通过养老金覆盖将有利于加速他们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步伐，在保障他们安享晚年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劳动力的新老更迭，从而促进生产效率提升。

养老金的劳动供给挤出效应确实存在吗？可观察到的劳动供给变化是由劳动参与变化导致的，劳动参与反映比劳动时间反映更重要。有关社会保障的劳动供给效应研究很多集中于劳动参与率变化（Heckman, 1993）。因此，我们基于经典的劳动参与决策模型（Labor participation model）^①，去观察养老金因素对于城乡中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影响，养老金因素考虑了养老金覆盖和养老金水平两个方面，实证模型估计考虑了城乡总体、农业与非农、劳动年龄与非劳动年龄等不同群体情况。根据劳动参与率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见表9和表10），在控制了经济、人力资本、性别、年龄、婚姻等特征因素后，养老金变量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反映出养老金的确存在明显的劳动供给挤出效应。

养老金对于城镇劳动年龄阶段人员的劳动供给挤出效应尤为突出。转轨过程中不完善的养老制度在造就大量城镇“退而不休”劳动者的同时，也在大量挤出宝贵的劳动力资源，过早享受养老金的人员由此失去了继续工作的激励。根据模型估计显示，被

① 劳动时间加总测量不可避免地存在误差，这会导致劳动时间数据比劳动参与率数据可靠性弱（Huffman & El-Osta, 1997），因此，劳动行为决策研究中较多关注于劳动参与模型研究（Ahearn et al., 2006），而放弃了劳动供给模型（Labor supply model），或者将后者作为辅助参考。

表 9 劳动参与率模型估计结果：养老金覆盖

解释变量	农业		非农		总体
	劳动年龄	非劳动年龄	劳动年龄	非劳动年龄	
养老金覆盖 (0 = 是, 1 = 否)	-0.185 *** (0.036)	-0.112 *** (0.017)	-0.457 *** (0.030)	-0.275 *** (0.051)	-0.198 *** (0.012)
收入对数	0.014 *** (0.002)	0.013 *** (0.005)	0.055 *** (0.012)	-0.005 (0.009)	0.019 *** (0.003)
户籍 (0 = 农业, 1 = 非农)					-0.345 *** (0.014)
性别 (0 = 女, 1 = 男)	0.066 *** (0.007)	0.140 *** (0.015)	0.148 *** (0.028)	0.185 *** (0.019)	0.145 *** (0.008)
年 龄	-0.004 *** (0.001)	-0.025 *** (0.001)	-0.014 *** (0.003)	-0.013 *** (0.002)	-0.016 *** (0.000)
教育年限	0.000 (0.001)	-0.005 ** (0.003)	-0.003 (0.004)	-0.011 *** (0.002)	-0.005 *** (0.001)
婚姻 (0 = 无配偶, 1 = 有配偶)	0.034 ** (0.017)	0.114 *** (0.019)	0.028 (0.055)	0.035 (0.027)	0.085 *** (0.013)
健康状况 = 较差	0.069 *** (0.008)	0.160 *** (0.029)	-0.094 (0.114)	0.037 (0.082)	0.135 *** (0.015)
健康状况 = 一般	0.176 *** (0.017)	0.298 *** (0.030)	0.000 (0.099)	0.128 * (0.068)	0.272 *** (0.018)
健康状况 = 较好	0.101 *** (0.007)	0.277 *** (0.021)	0.039 (0.098)	0.120 (0.094)	0.214 *** (0.011)
健康状况 = 很好	0.081 *** (0.005)	0.253 *** (0.022)	0.082 (0.095)	0.220 ** (0.127)	0.195 *** (0.009)
Pseudo R ²	0.11	0.17	0.28	0.19	0.31
样本量	6552	4795	1471	1409	14227

注：(1) 实证模型采用 dprobit 估计方法，估计系数为边际效应；(2) 括号里数值表示标准误，***、**、* 分别表示模型估计系数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ARLS) 2011-2012 年全国基线调查计算得到。

表 10 劳动参与率模型估计结果：养老金水平

解释变量	农业		非农		总体
	劳动年龄	非劳动年龄	劳动年龄	非劳动年龄	
养老金对数	-0.015 *** (0.003)	-0.017 *** (0.002)	-0.052 *** (0.004)	-0.025 *** (0.003)	-0.027 *** (0.001)
收入对数	0.016 *** (0.002)	0.017 *** (0.005)	0.078 *** (0.012)	0.023 ** (0.010)	0.026 *** (0.003)
户籍 (0 = 农业, 1 = 非农)					-0.323 *** (0.015)
性别 (0 = 女, 1 = 男)	0.073 *** (0.007)	0.145 *** (0.015)	0.128 *** (0.029)	0.172 *** (0.019)	0.146 *** (0.008)

续表

解释变量	农业		非农		总体
	劳动年龄	非劳动年龄	劳动年龄	非劳动年龄	
年 龄	-0.004 *** (0.001)	-0.024 *** (0.001)	-0.012 *** (0.003)	-0.012 *** (0.002)	-0.015 *** (0.000)
教育年限	0.000 (0.001)	-0.004 * (0.003)	-0.001 (0.004)	-0.012 *** (0.002)	-0.004 *** (0.001)
婚姻(0 = 无配偶, 1 = 有配偶)	0.067 *** (0.019)	0.118 *** (0.019)	0.050 (0.056)	0.031 (0.026)	0.105 *** (0.014)
健康状况 = 较差	0.074 *** (0.009)	0.149 *** (0.030)	-0.040 (0.109)	0.010 (0.074)	0.133 *** (0.015)
健康状况 = 一般	0.186 *** (0.017)	0.292 *** (0.031)	0.057 (0.100)	0.100 (0.067)	0.276 *** (0.019)
健康状况 = 较好	0.109 *** (0.008)	0.274 *** (0.022)	0.092 (0.094)	0.089 (0.088)	0.219 *** (0.012)
健康状况 = 很好	0.091 *** (0.006)	0.252 *** (0.023)	0.114 (0.090)	0.196 (0.122)	0.205 *** (0.010)
Pseudo R ²	0.11	0.17	0.28	0.21	0.30
样本量	6641	4844	1497	1428	14410

注：估计系数为边际效应，括号里数值表示标准误，***、**、* 分别表示模型估计系数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2 年全国基线调查计算得到。

养老金覆盖后城镇劳动年龄人员的劳动参与率将显著下降 45.7%，而养老金水平更高的人员，劳动参与率也显著地更低。蔡昉、王美艳（2004）曾经观察国有企业改革初期劳动力市场状况，发现离退休享受养老金、登记失业人员、或从下岗再就业中心领取生活补助的人更倾向于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Giles et al. (2012) 利用 2008-2009 年 CHARLS 调查数据观察中国中老年人的退休行为，也发现养老金是其中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享受养老金的人倾向于更早退休，结合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研究发现，在养老制度影响下，大龄城镇本地劳动力的参与率呈现出一个长期下降趋势，甚至已经低于英国、美国、印度尼西亚以及韩国。现行的退休制度导致大量城镇劳动者过早享受养老金，或者使其成为“退而不休”劳动者，从而导致劳动力市场扭曲；或者使其成为真正退休者，从而导致人力资源闲置和浪费。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见图 13），城镇女性从 45 岁开始劳动参与率突然猛烈下降，男性从 50 岁开始劳动参与率持续大幅度下降，现行退休制度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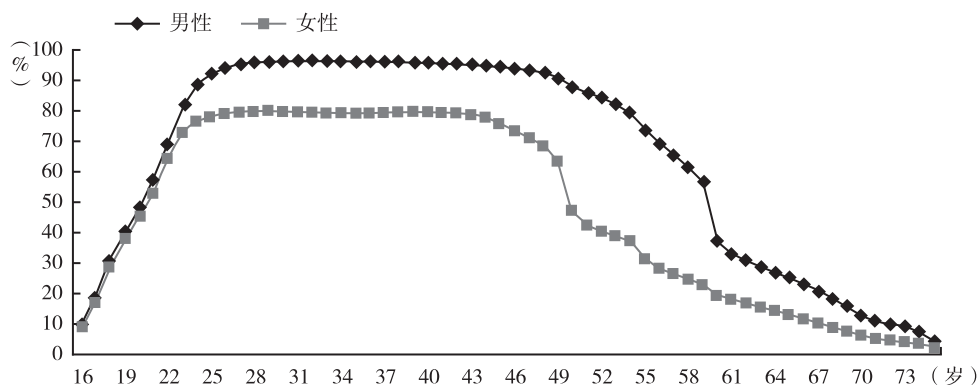


图 13 分年龄的城镇劳动参与率 (2010 年)

资料来源：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年龄汇总数据计算得到。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以“4050 人员”为主的闲置劳动力资源仍然具有较大的挖掘空间，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这些被长期冠以“就业困难”的群体应该被视为宝贵的人力资源（都阳、程杰，2013）。他们对于劳动力市场条件变化（如工资水平）更为敏感，尤其 45 ~ 59 岁之间的劳动参与潜力最大（都阳、陆旸，2013），通过完善制度和政策激励他们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能够显著地提高劳动参与率以增加劳动供给、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发达国家的改革经验也表明，推迟享受养老金年龄，或者削减养老金水平，将能够明显增加劳动供给水平（Mastrobuoni, 2009; Takashi et al., 2011）。尤其，接近退休年龄的中老年人的劳动决策更容易受到养老保障制度影响。Liebman et al. (2009) 研究发现，52 岁以上接近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对社会保障税费与收益的边际变化反应尤为敏感。

养老金对于农业劳动供给的挤出效应同样也显现。模型估计显示，被养老金覆盖的农业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将显著下降 11.2%，同样养老金水平提高也将激励劳动参与率进一步下降。程杰（2014）利用农户抽样调查数据观察了农村养老保障的劳动供给效应，发现养老保险覆盖会降低农户的劳动参与率，张川川等（2014）评估 2009 年开始实施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效果，也发现养老保障政策减少了老年人的劳动供给。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有研究表明（Filho, 2008），享受养老金使 55 岁以上农村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提高 38%。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老年化现象日益严重，老年人无法真正退出农业生产，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提升。陈锡文等（2011）研究证实，进入新世纪之后农村老龄化对农业产出的负面作用非常

显著。分散小农户为主导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难以转变，除了城乡二元结构和土地经营制度之外，养老金缺失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意味着随着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覆盖率提升，养老金水平逐步提高，将有利于降低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在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的情况下，加快农业劳动力代际更迭，让更多年轻、更有效率的劳动者替代老年人，从而推动整体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

五 就业友好的养老制度：他们应该如何退休？

“退而不休”劳动者是中国特定发展阶段与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劳动力市场中出现的一个典型现象。这类群体已经占到45岁及以上就业人员三分之一强，成为城乡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城乡内部的群体特征与形成机制存在明显差异，8400多万农村“退而不休”劳动者主要归因于养老保障制度缺失，不得不继续工作的老年劳动者占据四分之三，而1400多万城镇“退而不休”劳动者则主要归因于不完善的退休制度，享受养老金的同时仍然乐于工作的占据八成。尽管他们继续活跃在劳动力市场能够为经济社会创造价值，但也对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造成了扭曲，效率损失比较明显，尤其突出表现在城镇中，过早地享受养老金抑制了保留工资，干扰了均衡工资的形成机制，进一步扭曲了工资与收入分配格局，背后还潜藏着明显的劳动供给挤出效应，城镇中存在劳动力资源闲置和浪费。而农业劳动力的新老更迭被阻碍，“退而不休”劳动者现象背后反映的是公平与效率损失。

全面地理解“退而不休”劳动者现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背后涉及中国经历的二元结构变迁与经济社会体制转轨。如此大规模的“退而不休”劳动者存在，一定程度上有经济发展规律的合理成分，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传统要素供给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劳动参与率高^①是这一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背后更主要动因源自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改革不彻底、不规范的制度建设。养

^① 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初期，劳动力市场中供过于求、就业压力较大，劳动参与率一度出现明显下降。1995-2002年期间，城镇劳动参与率下降了9%~10%（蔡昉、王美艳，2004），主要由于城镇本地劳动力参与率持续下降，而大量农民工涌入城镇，年轻人的劳动参与率在提高（Cai et al., 2011）。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与劳动力市场改善，劳动参与率逐步恢复提高。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10年非农劳动参与率较2005年提高了2.7个百分点，其中，45~59岁之间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了7.1%~8.1%（都阳、陆旸，2013）。

老保障制度改革丧失了必要的独立性，让位于或服务于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大量提前退休现象旨在保障数千万下岗职工的顺利过渡，实际退休年龄严重偏离法定退休年龄，养老保障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特定群体的经济补偿手段，超越了自身的职能范畴，对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造成显著的扭曲。

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尚未成熟，面临二元经济结构、发展中阶段以及经济体制转轨的多重复杂性，既存在社会保障不足的低水平福利困境，又出现过度保护导致负激励的“穆勒难题”^①。一方面，顺应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力市场格局变化，更加积极的就业保护是公共政策的必然选择，也是在人口结构转变后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途径，通过不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生产率（包括劳动生产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找到未来经济持续增长之源泉（蔡昉，2010a；蔡昉，2013b），因此，全面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步伐仍然不能停歇。另一方面，同样十分重要的是，为了努力实现整体福利最大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需要去解决对劳动力市场的扭曲，设计合理的保障制度、确定适度的保障水平（Fuster，2007）。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历程和阶段性特征要求我们充分关注社会保障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如何构建“就业友好型”的社会保障制度^②，以及如何构建灵活而有保障的劳动力市场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考虑的重要议题^③。

“退而不休”劳动者群体内部形成机理差异很大，针对不同类型群体应该明确合理政策导向。总体思路和原则应该是：让不该退休的人成为公平竞争的正常劳动者，让应该退休的人有保障地顺利退出劳动力市场，让可以退休但有热情继续工作的人有发挥其价值的机会。确保这一思路能够实现，关键要改革目前退休与养老保障制度，建立与劳动力市场相协调的养老制度，避免养老制度扭曲劳动力市场，阻碍公平与效率，

① 斯图尔特·穆勒警告说，社会救助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救助行为本身，一种是对救助产生的依赖性，后者的危害性之大甚至可能抵消前一种结果的积极作用。解决“穆勒难题”的关键就是如何取得社会保护的共济性质与劳动力市场的激励性质之间的平衡（蔡昉，2013a）。

② 欧盟（European Commission，1997）较早提出“社保制度现代化”口号，提倡在社保制度中将义务和机会结合起来，赋予个人更多地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机会，社保制度本身就是一个生产要素，“就业导向型”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应该成为社保制度的核心目标之一。

③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3）针对2030年中国发展前景提出建议，构建一个灵活而有保障的劳动力市场，确保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权益的可携带性，以降低劳动力流动和配置的障碍，通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灵活就业安排以及扩大培训机会等措施，确保中老年城镇职工不会过早地退出劳动力市场。

我们可以称之为“就业友好的养老制度”。具体来看，“退而不休”劳动者的政策导向与措施可以考虑如下（见图 14）：

	劳动年龄	超过劳动年龄
未退休享受养老金	A	B（保障） （扩大覆盖率、提高养老金水平，保障劳动力新老更迭）
退休享受养老金	C（约束） （改革养老制度、统一退休年龄，严格规范养老金支付）	D（鼓励） （适度提高养老金水平，完善就业政策，鼓励进入劳动力市场）

图 14 “退而不休”劳动者的政策导向

群体 B：以保障为主，引导退出劳动力市场。这类群体可以说是相对处于最弱势地位，一方面他们缺乏养老金，不得不继续工作，另一方面他们人力资本水平不具有优势，在劳动力市场中难以获得更高工资收入，不论是农业劳动者还是城镇劳动者，这类群体的收入水平都是相对最低的。政策导向应该通过扩大养老保障覆盖率，逐步提高养老金水平，确保他们能够从“劳动者”转变为“退休者”，真正地安享晚年，这也有利于加速劳动力的新老更迭，为劳动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条件。

群体 C：以约束为主，将其转变为正常劳动者。这类群体对于劳动力市场的扭曲效应最强，过早获得养老金导致保留工资被抑制，直接干扰劳动力市场运行，也导致工资与收入差距扩大，造成严重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政策导向应该果断地改革目前退休制度，消除劳动力市场扭曲影响，严格法定退休年龄，保证实际退休年龄与法定退休年龄一致，明确养老制度的功能属性，严格规范养老金支付。这将显著地激发“4050 人员”的劳动参与积极性，缓解劳动力供给不足和潜在经济增长下降。对于确实存在就业困难的群体，以就业援助、技能培训的就业政策为主，辅助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其基本生活和稳定就业。

群体 D：以鼓励为主，优化转变为真正的“退而不休”劳动者。适度提高养老金水平，最大程度上避免老年人受困于养老金不足，迫于生计而不得不去工作，让老年人能够顺利地退出劳动力市场。对于具备良好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就业竞争力，有兴趣继续通过就业活动改善生活质量的群体，应该为其创造良好的公平就业环境，完善劳动合同、社会保险以及个人所得税等政策，消除他们进入到正规就业部门的制度性障

碍，采取适当的鼓励措施，类似于发达国家实施的最低工资制度豁免，减免所得税和社保费，延迟退休补助以及灵活的劳动合同等，使其成为与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中类似的“退而不休”劳动者。人口老龄化进程日益加深且难以阻挡，“退而不休”劳动者将长期存在，合理部分应该得到认同和保护，这不失为稳定劳动力供给、挖掘劳动力资源进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 蔡昉（2007），《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经济研究》第7期，第4-14页。
- 蔡昉（2010a），《刘易斯转折点与公共政策方向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第125-137页。
- 蔡昉（2010b），《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第4期，第4-13页。
- 蔡昉（2013a），《社会保护不是负激励：随发展阶段变化破解“穆勒难题”》，载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 14：从人口红利到制度红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63-176页。
- 蔡昉（2013b），《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第56-71页。
- 蔡昉、都阳（2011），《工资增长、工资趋同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学动态》第9期，第9-16页。
- 蔡昉、王美艳（2004），《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及其政策含义》，《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第68-79页。
- 陈锡文、陈昱阳、张建军（2011），《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产出影响的量化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第39-46页。
- 程杰（2014），《养老保障的劳动供给效应》，《经济研究》第10期，第60-73页。
- 都阳、程杰（2013），《针对就业困难群体实施积极就业政策》，载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 14：从人口红利到制度红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46-159页。
- 都阳、陆旸（2013），《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劳动供给形势与政策》，载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 14：从人口红利到制度红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 社,第38-59页。
- 封进、胡岩(2008),《中国城镇劳动力提前退休行为的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第88-94页。
- 李红岚、武玉宁(2000),《提前退休问题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2期,第60-63页。
- 陆铭、葛苏勤(2000),《经济转轨中的劳动供给变化趋势:理论、实证及含义》,《上海经济研究》第4期,第24-33页。
- 庞丽华、Scott Rozelle & Alan Brauw(2003),《中国农村老人的劳动供给研究》,《经济学(季刊)》第3期,第721-730页。
- 万广华(2006),《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均等:方法与证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王美艳(2009),《教育回报与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世界经济》第5期,第3-17页。
- 张川川、John Giles、赵耀辉(2014),《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效果评估》,《经济学(季刊)》第1期,第203-230页。
- 张翼、李江英(2000),《“强关系网”与退休老年人口的再就业》,《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第34-40页。
- Ahearn, Mary Clare, Hisham El-Osta & Joe Dewbre(2006). The Impact of Coupled and Decoupled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Off-farm Labor Participation of US Farm Operator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88, 393-409.
- Andrew, Samwick(1998). New Evidence on Pensions,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Timing of Retirem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70, 207-236.
- Benjamin, Dwayne, Loren Brandt & Jia-Zhueng Fan(2003). Ceaseless Toil? Health and Labor Supply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China. Working Papers, No. 579,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Bertrand, Marianne, Sendhil Mullainathan & Doug Miller(2003). Public Policy and Extended Families: Evidence from Pensions in South Africa.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7(1), 27-50.
- Brown, Mellssa, Kerstin Auman, Marcle Pitt-Catsouphe, Ellen Galinsky & James Bond(2010). Working in Retirement: A 21st Century Phenomenon. Families and Work Institute, New York.
- Cai, Fang, Yang Du & Meiyang Wang(2011). Labor Market Institute and Social Protection

- Mechanism. Background Paper for China 2030,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 Calasanti, Toni & Alessandro Bonanno (1992). Working “Over-Tim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Retirement of a Class.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3(1), 135 – 152.
- Davis-Friedmann, Deborah (1991). *Long Lives: Chinese Elderly 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ller, Jurgen, Leena Maxin & Madeleine Obieglo (2011). Silver Work: Implications for Organisations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of Work. *The Four Pillars*, No. 48.
- European Commission (1997). Modernising and Improving Social Protec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March.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2). Active Aging. Special Eurobarometer 378, European Commission, Brussels.
- Eurofound (2012). Income from Work after Retirement in the EU.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rofound, Luxembourg.
- Filho, Irineu Carvalho (2008). Old-Age Benefits and Retirement Decisions of Rural Elderly in Brazi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6, 129 – 146.
- Freeman, Richard (2008).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Discussion Paper 844,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 Fuster, Luisa (2007). Elimination of Social Security in a Dynastic Framework.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4, 113 – 145.
- Giles, John, Dewen Wang & Wei Cai (2012). The Labor Supply and Retirement Behavior of China’s Older Workers and Elderl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James Smith and Malay Majmundar (ed.), *Aging in Asia: Finding from New and Emerging Data Initiatives*. Washington, D. C. :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 Gobeski, Kirsten & Terry Beehr (2009). How Retirees Work: Predictors of Different Types of Bridge Employment.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0(3), 401 – 425.
- Heckman, James (1993). What Has Been Learnt about Labor Supply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 116 – 121.
- Huffman, Wallace & Hisham El-Osta (1997). Off-farm Work Participation, Off-farm Labor Supply and On-Farm Labor Demand of U. S. Farm Operators. Iowa State University Staff

Paper, No. 290, December.

- Inceoglu, Ilike, Jesse Segers & Dave Bartram (2012). Age-Related Difference in Work Motivatio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85(2), 300 – 329.
- Larsen, Mona & Peder Pedersen (2012). Paid Work after Retirement: Recent Trends in Denmark.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6537, May, Bonn.
- Liebman, Jeffrey, Erzo Luttmer & David Seif (2009). Labor Supply Responses to Marginal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Evidence from Discontinuiti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3, 1208 – 1223.
- Martín, Sánchez Alfonso (2010). Endogenous Retirement and Public Pension System Reform in Spain. *Economic Modelling*, 27, 336 – 349.
- Mastrobuoni, Giovanni (2009). Labor Supply Effects of the Recent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Cuts: Empirical Estimates Using Cohort Discontinuiti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3, 1224 – 1233.
- Mincer, Jacob (1974).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OECD (2006). *Live Longer, Work Longer*. Paris: OECD.
- Santos, Marcelo & Pedro Cavalcanti Ferreira (2004). The Effect of Social Security, Demography and Technology on Retirement. Economics Working Papers (Ensaio Economicos da EPGE), No. 683.
- Shorrocks, Anthony (1980). The Class of Additively Decomposable Inequality Measures. *Econometrica*, 48, 613 – 625.
- Shorrocks, Anthony (1999). Decomposition Procedures for Distributional Analysis: A Unified Framework Based on the Shapley Value. Mimeo,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Essex.
- Takashi, Oshio, Akiko Sato Oishi & Satoshi Shimizutani (2011). Social Security Reforms and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in Japan. *The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 62(2), 248 – 271.
- Wang, Mo & Shultz, Kenneth (2010). Employment Retirement: A Review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36(1), 172 – 206.
- World Bank (2013).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Society*. Washington D. C. : World Bank.

Laborers Working after Retirement: A Typical Phenomenon of China in Transition

Cheng Jie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A group of workers after retirement have always been active on the labor market of China, who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One is eligible to receive pension and still continues to work, the other one is the elderly without pension and continues to work.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s by the 2011 – 2012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urvey (CHARLS), the workers after retirement have accounted for 35 percent of the workers aged 45 and above. The total size is about 98 million and about 84 million for rural and 14 million for urban respectively. Most of the workers in rural were the elderly without pension, due to the absence of the rural pension system, while the workers in urban were covered by pension, due to the imperfect retirement system dur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ition. Workers after retirement as a typical phenomenon grew by China's specific development stage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lthough it is reasonable in some degree regards to the law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rucial reason is imperfect and distorted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related. The phenomenon remarkably reflects loss of the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on the labor market.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the pension system coordinated with the labor market, and to make clear and reasonable policy oriented for different groups of workers after retirement, so as to make people who shouldn't retire become ordinary workers to improve efficiency and equity, and to make people who should retire quit from the labor market to enjoy aging life.

Keywords: retirement, laborer, pension, transition

JEL Classification: J21, J32, H55

(责任编辑：周晓光)